

主編的話

五百年前，也就是 1521 年 5 月 20 日，一枚砲彈打碎了一位憧憬戰績功勳、宮廷鬢影的年輕人的夢。從而開始了聖依納爵·羅耀拉 (Ignatius Loyola) 的皈依，最終創立了耶穌會。1622 年 3 月 12 日，他和一位緊密夥伴、被稱為東亞宗徒的方濟各·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一同宣聖。為紀念這些上主恩慈的里程碑，從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7 月，耶穌會及其使命夥伴，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隆重慶祝依納爵年。耶穌會總會長蘇薩神父 (Arturo Sosa) 這樣提醒我們：我們不僅通過儀式或學術成果來慶祝這一年；相反，這是我們不斷皈依的機會。耶穌會團體和更廣大的依納爵伙伴被召叫「在基督內得見嶄新的一切」——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使命中祈求真正改變的恩典。

事實上，就在 2019 年 6 月耶穌會的普世性使徒優先 (UAP's) 公布幾個月後，一種具有傳染性的砲彈射遍了世界。COVID-19 大流行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縮短了太多人的生命；在這些變故中，耶穌會士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合作者旨在辨別實施 2019-2029 年普世使徒優先的計劃也被耽擱了。

夢想和行程的中斷並不意味著結束。像依納爵一樣，我們可以踏上朝聖之旅，有機會發現我們真正的渴望，看到被賜予的禮物，及體現所擁抱的使命。

依納爵根據自己的心靈朝聖之旅，寫成《神操》作為一種指導這種辨別的動態和親近上主之工具。另一份創始文件《耶穌會會典綱要》（1540年）闡明了耶穌會的使命：「扶助人靈進修並明瞭教會的道理，並以公開佈道傳揚天主的聖訓、領導退省 [spiritual exercises] 和愛德的工作，特別是以教理教育兒童及失學的人。」

從一開始，神操就根據退省者這個人和他或她的情況進行調整。這種牧靈調整認識到「一系列豐富的現實構成了退省者、指導者與作為整個事業最終主導者的天主聖三（即父、子和聖神）之間的關係。」（霍華德·格雷，《神操的動力》，第一講）。在當代，依納爵靈修越來越多地由訓練有素的平信徒合作者指導。這是一個可喜的發展，因為合作者進一步令耶穌會提供神操作為禮物的才能和應用多樣化。

有人說，這場大流行病喚醒了很多不同信仰或沒有信仰的人的精神渴望。有可能。其他壓力因素，如戰禍、氣候災難、流徙者和移民、社會分裂和經濟困難等，也呼喚出我們要作辨別和皈依的吶喊。

上一期的學報，主題是「依納爵靈修與當代世界」“Ignatian Spirituality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與UAP 2019-2029的第一項相呼應）。正如教宗方濟各所肯定的：「缺少這種祈禱的心態，其他的優先將無從結出果實。」在本期（#12）中，我們深入探討了《神操》的文本、它們的調整及與其他文化的相遇，包括女性主義文化、軀體心理治療，以及將朗尼根（Lonergan）的認知理論與與宗教、道德和形而上學的發展作跨學科整合。

陪伴和交談在耶穌會的靈修和事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依納爵靈修之旅中陪伴他人意味著什麼？有什麼是利害攸關呢？我們邀請了幾位靈修導師來反思他們的實踐。本期文章分為兩大類：前五篇關於神操，後三篇關於依納爵靈修指導。我和天主教研究中心感謝八位受邀撰稿人，他們在以下的文章中慷慨地分享了自己旅程的成果。

神操不僅僅促進個人的靈性成長。雅各伯·漢維神父（James Hanvey）負責支援全球耶穌會的牧靈工作和靈修，特別是關注神操的事工，他為我們引出神操的一些政治和文化含義。通過檢視《原則與基礎》及《兩旗默想》，漢維神父為我們解答了，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提出一個挑戰：為什麼要進行神操？其中利害攸關的是甚麼？

《原則與基礎》提醒我們，我們是屬於天主的。這就是我們超越的目的和價值，因此人與萬物的關係是相對的。當我們擺脫了那些向我們承諾絕對自由的虛假偶像，我們開始認識到我們的自由是有限的，但也是「蒙恩寵的」。「首先我們依賴天主，然後依賴團體和整個受造物。」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意味著「我們有責任為他人的利益負責，並幫助他們走向天主。」漢維神父這樣解釋：我們「蒙恩寵的自由」，雖然處於「人類有限且受壓的現實」中，但因著基督的復活而轉化。這讓我們有機會參與天主的救贖計劃。

辨別與選擇攸關。依漢維神父的說法：「基督是不可避免的決定時刻，出現在總是具有歷史和存在現實的『危機』時刻。」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他將《兩旗默想》作為揭示邪惡策略（尤其在我們當代）的詮釋關鍵。辨別不僅僅是一個「工具」，而是一

個「使徒時刻」。當我們允許自己與基督一起變得貧窮、被鄙視和謙卑時，辨別可就是徹底的實踐。如果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過著耶穌道成肉身的生活，我們會怎樣選擇？我們會否遵循耶穌拒絕暴力和犧牲受害者的「修和實踐」，從而加入十字架的奇妙救贖工程？漢維神父繼續問道，如果我們可以制定優先以考慮當代窮人（*anawim*）、無權者和被邊緣化、經濟和文化被剝奪者的福祉為價值指引的社會、經濟和教育政策，這意味什麼？漢維神父提醒我們：整個神操的動力是「在」歷史中的一個深刻的、變革之旅。被轉化就是作為基督的同伴再次被派到世界上去，在歷史中創造一個新的空間，一種新的可能性。

「依納爵靈修其中最獨特之處是開啟對所有事物、所有受造物愛的凝視，而這由對祈禱者的慈悲和無條件的接受開始。」為了解這種靈修的起源和發展，何塞·加西亞·德卡斯特羅神父（García De Castro Valdés）帶我們穿越耶穌會的整段歷史。受神操的啟發（主要是「獲得愛情的默觀」，230-237），耶穌會士相信可以在一切事物中尋找並找到天主。因此，「耶穌會臨在不同的地方和非常多樣化的環境中，這種臨在主要以行動來解釋它的宗教經驗，她愛天主和愛鄰人的特殊方式。」

雖然依納爵·羅耀拉的經歷和他尋找上主的新方法是基礎，但初期同伴決定組建一個 *Societas*（「同伴關係」）。他們一起確認了耶穌會的使徒身份，富創意地適應各種事工，一起往遙遠的地方傳教，許多人更慷慨地用他們的生命為福音作見證；他們在政治鎮壓中倖存下來，並通過與他人合作而茁壯成長。四百八十多年來，通過團體辨別，並留意聖神的觸動，該會一直保持著一份柔軟度，繼續為依納爵靈修開闢新的維度。加西亞神父指出，

最近，借鑒耶穌會豐富的傳教傳統，「依納爵靈修回到文化幅度，作為卓有成效的使命的主要因素之一。一旦靈修進入一種文化，對話的過程就開始了。」這種靈修是發展「對話文化」的關鍵；它是一種「傾聽、向他人敞開心扉，並準備開始對話以創造更美好世界」的靈修。

韋沐天神父（Monty Williams）以愛的告白或宣認開啓他的文章。作為一位經驗豐富的神操導師，他提出這樣的洞見：不是我們對天主懷有渴望，而更根本的是，我們受造為對天主的渴望。然而，我們「對這份與上主的首要關係懷著一種矛盾心理——我們既被這種親密關係所吸引，又對這種關係猶豫不決」，這份矛盾也使我們的辨別變得複雜。

韋神父用了一個空間隱喻來追溯那貫通神操四週（四階段）的渴望動力——這空間是經由日常步行，而非由一個規條繪製的城市所建構。愛的旅程不是線性的。的確，每個階段的神慰都會成為我們進入後續層次的辨別障礙。從第一階段自我封閉的安全開始，原來被愛的發現揭示了將我們束縛在恐懼中的虛幻。「我們讓與耶穌的活生生的關係，而不是習以為是對真理的文化和智力的理解，即自己的偏執，成為我們辨別的基礎」（第二階段）。正如基督在第一階段的靈性親密體驗中一直在我們身邊，我們被要求以世界不認識自己的方式去認識世界（第三階段）。最後，我們達到了一種滿足於默觀天主的被動狀態，但同時也是對「創造力的呼喚，這種創造力在與其他人的分裂及疏離中建立團體」。韋神父稱這為行動中的默觀。

在文章的最後一部分，韋神父對比了自戀（恐懼）和自我超越（愛）的動力。恐懼的力量在今天許多地方都很嚴峻。韋神父

的忠告值得我們注意：「在我們辨別之前，無論是關於我們該做什麼，或是該如何理解我們生活的處境，我們有必要發展與天主的親密關係，這是我們的主要關係。如果沒有這關係，我們就會誤解我們所有的處境，無論是神聖的和世俗的。」

以辨別為關鍵，多瑪斯·謝爾曼神父（Thomas P. Sherman）仔細研究了兩部經典文本，即聖依納爵的《神操》和老子的《道德經》，作為亞里士多德所指的幸福生活的實用指南。謝爾曼神父回顧了依納爵關於第一週和第二週辨別神類的規則，以表明「如果辨別神類確實是一種把生活方式的選擇（或退省者的任何重要決定）確定為切合天主旨意的方法，主觀的神慰體驗……必須包括教會信仰的客觀標準。」「退省者在選擇一種生活方式或行為時，不僅必須參考自己對神類的主觀體驗，而且最終這種選擇必須至少符合信仰團體所理解的基督的生活。」謝爾曼神父建議，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依納爵將選擇界定為在教會合法的範圍內（170-174，cf. 189），並用一個附錄結束神操，題為：「與教會一起思考的規則（352-370）。」

《道德經》雖然不是宗教典籍，但它衡量一個人與道的關係：「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41）。」謝爾曼神父將《道德經》作為辨別的指南，因為「生活得有德性，也知道自己這樣生活，要求聖人不僅要認知自己內心平靜與和諧的體驗作為標準，而且還要認識到那符合與大自然的真正（而不是表面上的）和諧並能促進人類社會和諧的客觀標準。」他舉了戰爭的例子。「師之所處，荊棘生焉」（30）。暴力違背道性，聖人自然避而遠之。文中接著說：「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這節經文暗示聖人認識到

形勢迫使他去戰鬥。這認識的前提是他對局勢作了評估和做了拿起武器的選擇。聖人可以根據什麼標準來選擇？他內心平靜與和諧的經歷似乎無法為選擇採取行動或不採取行動提供任何理由。但這節經文暗示聖人確實選擇拿起武器，而他的選擇符合道。通過研究《道德經》中的類似例子，謝爾曼神父總結道：「我們從這兩部作品中了解到，如果我們要生活得有德性，並且知道自己是這樣生活，我們需要做的辨別不僅基於自我辯解的經驗（即神慰或內心的平靜與和諧），而且是基於客觀，或自我超越的標準。」

張淑芬博士引用依納爵神操第一條：「任何準備整理靈魂，驅除邪情，好能認清天主的聖意，以便調整自己的生活……也都叫『神操』。」她指出，特別是對於女性來說，這種錯亂的傾向，往往歸因於社會結構。在男權社會中，人們將天主視為男性統治者，「罪應被理解為對天上皇權的反叛行為」。然而，女人的罪不在於驕傲和自以為是，而是在於自我懷疑、膽怯、無力感，甚至是自我憎恨的罪。一個女性主義的靈修指導者「可能會鼓勵女性承擔責任和決策的角色，而不是探索驕傲的事例」。

張博士大量引用女性主義文本和學者。例如，心理學家卡羅爾·吉利根（Carol Gilligan）發現，當男性使用抽象的規則或原則來做決定時，女性似乎將道德問題視為「責任和關係的衝突而不是權利衝突」引起的問題。她認為，女性在做出道德決定時始終將人際關係和個人責任作為主要參考。韋爾斯利學院斯通輔導服務中心的理論家斷言，女性自我的發展是一種「關係中的自我」，而不是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提出的「分離-個體化」模型。一般而言，女性不會在一份連繫中感到受威脅，而是藉此

機會建構和發展自我。因此，準備靈魂，驅除錯亂的偏情意味著更新女性與天主的關係中的自我。

張博士在四週的神操中展示了相互參與、相互同情和相互賦權的動態。她的結論是，女性主義的神操陪伴者應該意識到退省者的性心理發展，調整神操中的男性化語言，以促進交互主體性的成長。天主的慈悲不是恢復神的恩惠，而是一種同理心的賦權。莫琳·阿格勒（Maureen Aggeler）的一句話總結了女性的這一旅程：「自由意味著『她的位格是她自己的』。她自由、獨自的代價意味著儘管她是一個在關係中的人，但只有她可以或必須為自己的所見所聞負責。」

董澤龍神父理解第一個原則與基礎的含義之一，是在一個人的內心和靈修生活中保持對立動態的張力，以達致平心對待世上的一切事物。因此，靈修指導的主要意義和功能是通過靈修導師的幫助，承認並處理一個人在生活經驗和祈禱中的這種張力，從而達到愈顯主榮的內在自由。

以這種張力為範式，他認為它普遍存在於靈修指導的過程以及指導者與退省者之間的關係中。他舉例說明五種可能的張力，即沉默對比較談、情感相對理性、世俗生活對比靈修體驗、完全接受對比跟隨教會訓導、人的努力對比天主的恩寵。正如朗尼根的超驗方法所暗示的那樣，提高對這一現實的意識對於在靈修指導的服務中相互的真我體認至關重要。

依納爵靈修是通往真實性的旅程。但並非所有的渴求都是真實的。在她的文章中，思維靜院培育主任羅家慧女士闡明了朗尼根（Bernard Lonergan）的認知理論如何成為一個有用的框架，來陪伴避靜者的旅程，一個通過連串的皈依（宗教、道德、智力和

心理) 到達真實性的旅程。根據朗尼根的說法，只有在自主的人類主體中，經驗、理解、判斷和抉擇的自我超越階段才能發生。真實的主體遵循超驗指令 (transcendental precepts) 實踐留心、聰敏、合理、負責。當一個人從偏見和自我陶醉轉變為留心經驗、明智地理解、合理地判斷、且負責任地抉擇，就會產生皈依。

愛會激勵一個人在意識運作中遵循超驗指令，而恐懼則會助長偏見並導致衰退。朗尼根將逃避理解和逃避責任定義為阻礙真實性持續增長並導致不真實性的偏見。靈修導師可以幫助行神操者從關注外部事件轉變為對自己內部運作的自我體認。雖然靈修導師與行神操者一起探索他們的個人經歷，但重點不是減輕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將經歷的人性層面解開作為祈禱的準備。羅女士認為：「對自己有意識的臨在是對他者臨在的基礎。」

黎桂英女士注意到神經系統科學的當代發展，並介紹了 Somatic Experiencing，一種以身體為導向的創傷治療模式，由彼得·萊文 (Peter Levine) 在1970年代開發，作為在靈修指導上辨別神類的一種方法。她引用俄國出生的神經病理學家保羅·雅科夫列夫 (Paul Yakovlev) 的話，他挑戰了自上而下的模型，即身體的「低級」功能是由「高級」思維的大腦控制。雅科夫列夫認為，進化上最原始的大腦結構，即「腦幹 (稱為「爬蟲腦」) 和下視丘 (「邊緣腦」) 是「大腦的其餘部分及行為賴以合成闡述的基質。」

現代成像技術使我們能夠看到「情緒的身體地圖」——內臟中的血流；當一個想法出現時，或者當有一種感覺時，哪些神經單位是如何被「激發」的。思想充滿情感。黎女士引用依納爵關於內在知識——「因為不是知道的多，而是內心的玩味品嚐更使

人滿意」——和《神操》中的〈感官祈禱〉。有關這議題，傑瑪·西蒙茲 (Gemma Simmonds) 的一篇文章 (〈理解感官的應用〉) 可助我們加深了解。西蒙茲評論道：「西班牙語單詞 *sentir* 與英語中的 'to sense' 都同是雙關語，因為它包括心理和身體過程，但 *sentir* 是一個更廣泛的詞，包括直覺和情感。特別是在神操的第二週，感官被視為祈禱和辨別的工具。當耶穌通過自己的身體感官行事時，而我們臨在於耶穌，與他同在，我們會更深入地分享他的人性經歷和自我理解。……當我們祈禱渴望分享耶穌的感覺和感受時，這並不是因我們的思想不能帶我們再進一步……反之，當我們的感覺和情感渴望將我們帶向與理性思維不同的方向時，這對我們來說通常是混亂和模稜兩可的根源，正正是這時刻，我們需要祈禱被轉化。」對於西蒙茲來說，它證實了「基督的心意 (格前 2:16)」是可靠的，它使我們能夠感受耶穌的感受，並擁有他的思維。黎女士最後以兩個案例作為總結，她使用 SIBAM (感覺、圖像、行為、情感和意義)，一種軀體體驗工具，來檢查神類的動態，並「在我們的活動和意識的整個範圍內檢測那通過聖神引導和光照我們的動態，以及其他影響；這些影響，如果賦予它們思想，會相反聖神的指導和光照。」

天主教研究中心是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個單位，而大學是一個學術的地方 (來自拉丁語 *schola*，意思是「工作的間歇，學習的閒暇；學習的談話」)。當香港耶穌會 2019 年 8 月開始贊助中大天主教研究中心，中心同時成為耶穌會在學術領域使徒工作的一部分，重點是學術、實踐和使命。「使徒」一詞的意思是「被差派為門徒」；正如我們在《耶穌會會典綱要》中所回憶的那樣，我們是一個致力於基督徒生活和教義中靈魂進步以及信仰傳播的同伴關係。

在蘇薩神父獲選為總會長後的第一次訪問中，他強調了知識的深度。他大膽地說：「我們需要了解當今世界和當今教會中正在發生的事情，以便了解信仰。」在依納爵年的開始，他繼續說道：「我們祈求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使命中真正改變的恩典」；「在基督內得見嶄新的一切」。我們希望本期關於神操及依納爵靈修指導的文章能夠引發對話，甚至與同事和所有善心的人合作，這將有助於我們辨別各自的人生使命：

我們傳播的知識和理解，它們是否揭示了所有存在物的美和真理？我們所學到的知識會否改變關係和社會結構，使那些尊嚴受到侵犯的人能夠自由地茁壯成長並為大眾公益做出貢獻？我們會否去設計從地方到全球層面的治理體系——基於輔助原則、透明度和衝突解決——這樣我們孩子的孩子的生活可以持續？

我們正踏上朝聖之旅去辨別和實踐四項普世性使徒優先：

- 一. 通過神操及分辨，揭示邁向天主之路；
- 二. 在修和及正義的使命中，與窮人、被世界遺棄者、其尊嚴受侵犯者同行；
- 三. 陪同年輕人創建充滿希望的未來；
- 四. 攜手照顧我們的共同家園。

你願意加入我們的靈性和知性之旅嗎？

董澤龍神父